

国的鼻祖。”

老师的晚年，子女不在身边，他的入室弟子赖德霖、吴耀东一直像儿孙一样照顾二老。后来，赖德霖去了美国。老师仙去后，吴耀东为他操办了丧事，并且照顾着师母。另一位入室弟子陈伯冲乘飞机专程从上海赶来吊唁，还有一位叫贺承军的，据说并不是老师亲炙的私淑弟子，也专程从外地赶来吊唁。还有深圳大学当时的建筑系主任许安之也专程前来吊唁，说他们一直感念汪师创办深圳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院和《世界建筑导报》的丰功伟绩，说汪师住过的房子还保留着，将来要作纪念馆。1960届学长罗森代表他们班级献了一个最大的花圈。

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想写一副挽联，

作一首挽诗，却怎么也写不成、作不成，脑海里萦绕的总是学养完粹、功业炳耀、品德高尚、奇人高士、千秋师表这样一些断句，而不能连缀成篇。“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老师的逝去，不仅是清华建筑系、清华大学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建筑界、建筑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楼台贴地太纷纷，出世人高静不闻。山顶晴霞山脚雨，仙凡只隔一重云。”老师仙去，我总是想到这首古诗。当时吴耀东等人筹划要为老师出一本纪念文集，我写了一篇《哭汪师》交给他，后来种种原因纪念文集未能出版。如今正逢先生诞辰百年，希望能在《清华校友通讯》一角刊发此文，是为通告汪师遍布海内外的桃李学子。
2016年5月12日

缅怀父亲张新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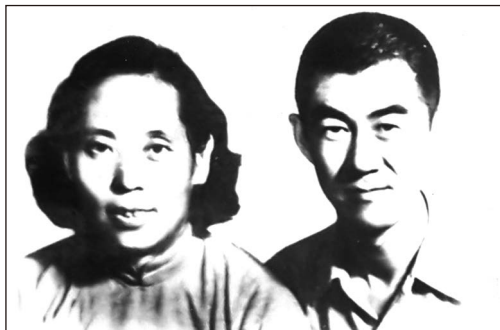
○张路英

我的父亲张新铭于1994年8月14日病逝，至今已20多年了。他虽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却难以忘怀他的许多往事。

父亲生于1916年5月2日，原籍山西崞县（现为原平县），四岁到太原。我的爷爷张孔怀是公费留日学生，毕业于日本农业大学，系畜牧专家。抗战前当过公营牧场场长兼技正（即总工程师），还创办过山西省第一个农研所场，当过几年农专教员，干过两年县税局长，还置有少量土地出租。

父亲童年聪慧，在太原国师附小读书时成绩较好，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一。1928年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名列第三。1931年暑假又考入北京市立一中，半年后又转回进山高中学习。

在读初中时，父亲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影响，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政治上拥护共产党，行动上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宣传活动。1933年由任弼绍介绍，父亲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帮助散发秘密小报、传单。



张新铭与夫人郭云贵

1934年秋天，在进山高年级同学裴丽生、宋邵文同志领导下，父亲与王达成等建立了一个读书会。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牛佩琮找我父亲恢复了“社联”关系。与同年级的杨述、赵继昌一个小组。

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3月，父亲和同寝室同学王瑶等十数人一同被捕。第四天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领回学校。父亲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5年12月9日那天，父亲曾爬进城，找到黄敬，在北大游行队伍中打出“清华大学”的校旗。父亲对我说过，“‘一二·九’运动中黄敬同志是主要领导和积极分子”。看来他们在“一二·九”运动时很熟悉，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询问过他关于运动中的具体情况。

据妈妈的好友宋立讲，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在给同学好友当伴郎和伴娘时认识的，他们一见钟情。那时，我爷爷已经给父亲定了亲，但父亲激烈地反抗爷爷的封建专制，最后爷爷只好做了让步，同意了我父母的结合。我外祖父曾任云南省检察长，是山西省太原市最有名望的大律师。我母亲郭云贵在中学时就参加了抗日学生运动。由于有人供出母亲的十几个同学是学生运

动的积极分子，当局要逮捕她们。我的外祖父事先知道了名单，母亲就让小她十岁的舅舅郭嘉樾一个个上门通知了她的同学，躲避了敌人的搜捕。她救助的同学有王子如（后曾任北京市卫生局长，市政协主席）、宋立（杜润生夫人）等。

1936年，父亲与母亲结婚，1937年有了第一个儿子。抗日战争刚爆发时，父亲到李昌同志领导的牺盟会总队工作。1939年4月父亲被调去牺盟总会，任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底，父亲和母亲穿过封锁线，到达了日夜向往的太行根据地。

过了两个月，组织上把父亲调到《胜利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又过了一个月，李一清同志把父亲调到太行区委，在杜润生同志领导下任教育科科长，后任教育处编辑科长，直到1942年7月。

在革命的血与火锤炼中，父亲更坚定地认识到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在1940年，他曾两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因有两次被捕的问题没有澄清，未予考虑。当时，父亲“对党毫无怨言，工作更积极，自己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如果永远不能接受自己入党，就永远做一个忠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41年夏，父亲又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关于两次被捕问题由裴骊生、李一清同志分别写了书面证明。由宋立、吴文光做介绍人，父亲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1942年7月父亲刚一入党，边区政府紧缩机构，即被派到偏城县任县长，参加领导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和反扫荡武装斗争。1943年9月，刚确定父亲工作留在边区一所任教育科长时，偏城发生特务案子。父亲被诬陷，带脚镣关押了七个月的时间，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这期间杜润生同志来看过他。后来党组织派高级干部戎子和等审理此案，最后予以平反。父亲生前没有对我们讲过案子的详细经过，后来与父亲遗体告别时，听当时处理过此案的戎子和同志十分感慨地说：

“一个偏城事件，就死了三百多人啊！”由此可见父亲在这个事件中确实是坚持了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45年4月，父亲又在边区政府任教育科长半年。11月份去邢台师范任校长两个月后调回长治师范任校长近四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父亲努力办好解放区的师范学校，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人才和干部。

为了革命事业，父亲把他的长子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7岁病逝，二子活不了满一周岁，三子活了两周岁多。1945年抗



晚年的张新铭、郭云贵夫妇

战胜利后出生的民主和路英，1948年曾同时得了肺炎，多亏当时边区卫生局长王子如同志找了几针青霉素，才救活了她们。路华、路雄是双胞胎，出生一个月后，父母因公出差一个月，回来才知道路华的奶妈没有奶水，是个骗子，成天给灌米汤，差点把她饿死。我们的父母总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家事放在后面。

1949年10月山西省总工会成立时，调父亲任文教部长。1950年2月，任秘书长。1952年兼任干部学习的理论教员，教授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边学边教的过程中，父亲的理论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953年7月，父亲调往北京筹备华北干部学校，后任华北干校常务副校长。黄敬在天津任市长时，父亲还去天津为干部讲过课。1956年，父亲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

1958年，父亲被调去筹建中国科技大学，任筹备处副主任，因主任长期患病，所以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常常要加班加点，中午不休息，晚上要干到十点，才被车送回家。父亲从建校舍，调教员、干部，筹备招生，从1959年开始招生到1963年，中科大的在校生即达一万人，当时成为排名于北大、清华之后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为中科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时，父亲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从1960年到1961年作为实际上的一把手，主持了一年多工作。

父亲从1949年就发现有糖尿病，自己天天打胰岛素坚持几十年，却很少休病假。为了办好中国科技大学，累得体重下降得

很厉害，1.75 米的个头连 100 斤都不到。1961 年才在医生要求下，在阜外医院住了两个月。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被戴高帽，罚跪，挨批斗，住牛棚。他那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任党委书记，副所长，他同秦力生和童第周一一起在所里住牛棚，养狗，养小白鼠，扫厕所，挨批斗。

后来，父亲被释放回家，很长时间都没有分配工作。那段时间，爸爸与杜润生伯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一星期就要会晤三五次。那时候，我们家被赶到一个大杂院的小平房里，在大树底下做饭，使用公厕。院里的公厕常常堵，爸爸总是下手去掏，坚持干了好几年。从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了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所体现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

改革开放后的 1980 年，父亲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即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主持工作的初期，就提出先把旁边可用的几十亩地要到手，还要办个研究生院预科，以后慢慢发展，但没有成功。这期间他参与了李政道博士提议的选派留学生的工作决策，为我国造就了一批有生气的科技骨干。现任的中科院领导、院士和成百的司局干部都是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毕业生。“文革”后，父亲还介绍童第周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生前十分喜欢读书，据爸爸的学生讲，在太行根据地时，父亲骑在马背上在去开会的路上还要看书。刚离休时，父亲的眼睛还没坏，他每天书报不离手，吃饭要三请。后来很快眼睛就几乎失明了，不能看书了。

父亲还曾对我讲过，他上清华大学时，山西省出了 100 银元，进山中学阎锡山出了 100 银元，我爷爷还得给他 100 多银元，一年花去 300 多银元。那时 300 多银元可以买 30 多头猪！1982 年，分别 40 多年的姑姑从台湾来看父亲，她说，当年我爷爷早就给他备好留洋的学费，希望他南下完成学业然后去留洋。可父亲还是参加了共产党，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父母为了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无怨无悔，母亲在逝世前说过：“我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奋斗了一辈子，没留给你们任何财产。”他们用一生证明了自己是无私的共产党人。

父亲最后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近 8 个月。在他病重期间，郑天翔伯伯、杜润生伯伯等都去看望过他。1994 年 8 月 14 日爸爸刚停止呼吸，杜润生伯伯就赶到医院，他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里像你爸爸这样的干部可不多啊！”爸爸一生艰苦朴素，不辱清华学人的正气，求真务实，一辈子实干，刚直不阿。

父亲去世后，出席遗体告别的老同志很多，有杜润生、戎子和、裴骊生、郑天翔等，还有他清华大学的学友姚依林、钱学森、陈宝仁都送了花圈，科学院和研究生院的数百人都来为父亲送行。

我的母亲先于父亲在 1990 年去世，1996 年清明节后，我们的父母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东侧。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我们永远深深地缅怀你们。

